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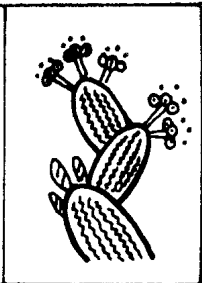


艺术的妙谛

陈 丹 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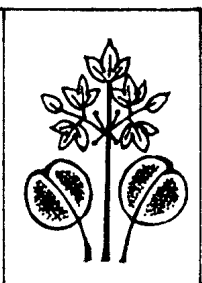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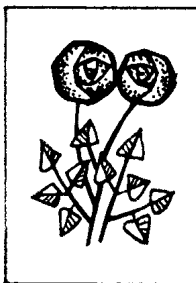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正 70/12



艺术的妙谛

陈 丹 晨 著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023782

艺术的妙谛

陈 丹 晨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9.125 印张 6插页 226,000 字 印数：1—565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52 定价：1.50 元

DE 7-11

目 录

评大连会议和“中间人物”论	(1)
写“中间人物”问题再探讨	(14)
“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	(24)
真实、理想和小市民习气	
——几篇有争议的小说读后	(31)
“写本质”与“写光明”	(41)
多样性,生活和艺术的妙谛	(47)
现实主义既不危险,也不过时	(63)
也谈现代派与中国文学	
——致冯骥才同志的信	(67)
典型化——多样化	(76)
理性、模糊性和文学创作	(92)
再谈理性、模糊性和其他	(107)
略谈人性描写中的几个问题	(129)
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与文学创作	(143)
生活·激情·创造性	(160)
关于《深入生活琐谈》的琐谈	
——与蔡天心同志商榷	(164)
论作家与生活的关系	(171)
再论作家与生活的关系	(186)

艺术的赝品和作家的责任

——关于“公式化”问题的断想……………(197)

还是有点“余味”的好……………(205)

带来了时代的讯息……………(208)

平庸与精品

——对未来短篇创作的一些妄测……………(211)

讲故事与民族化问题……………(216)

当你不能自己的时候……………(221)

心灵祭坛前的声音实录

——《巴金论创作》读后……………(226)

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刍议……………(239)

教条主义文艺理论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247)

关于文艺理论批评的断想

——呼唤别林斯基的出现有感……………(259)

文艺创作的广阔天地……………(272)

“十六年”无差别吗?

——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279)

后记……………(287)

评大连会议和“中间人物”论

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到底有什么问题？荃麟同志挨批受整，最后含冤屈死的起因大连会议的真相是怎么一回事？所谓荃麟同志鼓吹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是非又是如何？这些都是文艺界一直关心注意的问题。打倒“四人帮”已经二年有余了，我们全党的工作重点正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面来；文艺战线却仍然还有一些重大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有待尽快澄清，以利于文艺工作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例如上述这些被林彪、“四人帮”诬陷为“黑帮黑线人物”、“黑会”、“黑论”的冤案，至今还没有得到平反。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只有彻底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告慰死者，还以清白的本来面目；勉励生者，砸碎精神枷锁，解放思想，轻装前进。

一、大连会议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会，而是一次革命文学工作者研究文学创作如何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会议

为了正确判断大连会议的是非功过，我们首先要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

内”^①。离开了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事情的真相就会被一些扑朔迷离的言辞掩盖起来，弄得模糊不清、是非颠倒，这就是过去出现过的情况，也正是我们今天必须避免的。

对于当时的历史情况，人们是很难忘却的。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了一次巨大的挫折和倒退。其原因，除了自然灾害以外，也还由于我们政治、经济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错误。极左思潮进行了干扰和破坏，违反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农村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乱刮，大大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党中央也曾总结过这些历史经验，指出：当我们对于客观存在的规律还没有认识之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②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在全国各条战线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并确立了国民经济中的农轻重的关系，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明确了党的农村政策等等，从而扭转了这个危难的局面。

为了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改正那种搞浮夸、说假话、乱戴帽子、乱打棍子等恶劣作风，党中央还曾一再强调要发扬民主，要讲老实话，要鼓励人们敢于讲心里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在一次文艺工作的会议上说：“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指出：“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现在我们要使人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③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号召：“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

① 《论民族自决权》，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③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①

一九六二年八月的大连会议就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由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会议名叫“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研究文学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如何针对当时农村社会现实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反映农村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荃麟同志主持这个会议，作了多次发言；作协主席茅盾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作了发言；中宣部副部长、文联副主席周扬同志在会上作了讲话。参加会议的有八个省市十六位作家评论家，多数都是擅长描写农村生活，为群众所熟悉喜爱的、有影响的作家。其中有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西戎、李束为、李满天、马加、韶华、方冰、刘澍德、侯金镜、陈笑雨、胡采等。

在这个会议上，作家们根据自己亲身的见闻感受，揭露了前些年农村生活中大量的阴暗面：违反客观规律，不从实际出发，不关心农民群众的疾苦，侵犯农民群众的利益，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工农之间的联盟，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许多蠢事”；同时指出，在农村大变动的过程中带来的许多严重问题，也造成了农民群众一定的精神负担和思想混乱。所以，荃麟同志在会议一开始就说，我国文艺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数量一直居于多数，作家大部分来自农村，这方面的生活、创作经验比较丰富，形成了一个传统。因此，有必要进行探讨。他还认为，前几年国民经济“生产大幅度下降，农村矛盾就突出了”。“现在是全国团结起来克服困难。作家们是关心这个问题的”。“怎样描写农村题材，正确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恐怕是创作重大的责任”。而“文学的任务就是要在這時加强思想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反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复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我们文学的根本任务”。文学要反映社会矛盾，但“不是客观主义的反映矛盾，而是为了团结教育人”。

显然，包括荃麟同志在内的这些作家评论家是怀着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革命责任感，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在探讨研究当时农村、国家所发生的种种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认识。他们主要表现了对于当时处在严重困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和关怀，要求用文艺作品真实地深刻地去描写农民群众的生活、思想和感情；通过描写“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农民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来表现现实中劳动人民的积极的力量，积极的因素”，“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发展集体经济，还是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看出，同志们考虑问题的焦点是集中在如何用文艺创作来反映生活中的主流，来维护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这次会议还总结了这些年文艺创作的情况，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批评了作品中存在的浮夸、虚假等不良倾向，指出这和要求是不一致的。大家赞扬了赵树理同志在五风严重情况下，甚至面对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进行错误批评，仍然不消极，坚持党性原则，在作品中不说假话，采取严谨的创作态度。人们认为一个作家就是应该有这种求实精神，只有“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才能写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作品。列宁要求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要表现“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①毛泽东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②。大连会议正是体现了这样一些精神。说明

①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见《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50页。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些作家艺术家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的。他们和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对人民群众怀着满腔热情，对党的革命文艺事业极端负责，敢于大声疾呼讲真话，揭露矛盾，这是和党中央的号召完全一致的。这种严肃的革命精神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很可贵的，值得发扬的。

由此可见，大连会议是一次文艺工作者研究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探讨文艺创作中的问题的会议，是在党领导下举行的、光明正大的、有利于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的会议，对于文学创作克服不良倾向，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具有积极意义的会议。即使到了今天，由于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与当年也不无一些相似之处，因此，在大连会议上许多作家评论家发表的某些深刻的意见，对于我们也还仍然是一个借鉴。然而“四人帮”却恶毒诬陷这是一次“猖狂地攻击三面红旗，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鼓吹‘单干’，鼓吹‘三自一包’，为刘少奇搞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的黑会”，“是一个被资产阶级专了政的、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会议”。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冤案，难道还不应该彻底推倒平反吗？

二、“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不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黑理论，而是文艺工作者对文艺创作的一种正当的探讨

当年，批判大连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由于邵荃麟等同志在会上鼓吹了“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既然，大连会议是一次作家评论家研究创作问题的座谈会，就应该按照党的双百方针，提倡发表不同意见，进行自由讨论，明辨是非，提高认识。诸如所谓“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且不说是否已经成为“论”）等，都是革命文艺工作者内部

对于文学创作理论的一种探讨性的意见，是属于学术理论问题范畴的；即使有错误，也是应该通过实事求是的讨论，善意的帮助来加以解决的。但在一九六四年前后，在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等错误批评的影响下，文艺界极左的风又重新刮了起来，而且，越刮越厉害。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指出的“五子登科”，“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①等现象又泛滥了。对大连会议、“中间人物”论等的批判就是当时各种各样的批判内容之一，它和其它许多批判一样恰恰重犯了周恩来同志所批评的那种错误。《文艺报》编辑部当时发表文章，就指责这两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到了一九六六年，林彪、江青一伙又进一步把这两论诬陷为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成为“黑八论”中的重要两论，说成是一种“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逆流”。他们挥舞“文艺黑线”论的大棒，进行了大规模的、气势汹汹的恶毒围攻；并且还打着所谓工农兵群众“满怀革命义愤参加斗争”的旗子，声称要坚决“锄掉‘写中间人物’论这株大毒草”，“拔掉”“邵荃麟等已经打出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旗”，借以迫害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这种极其险恶、极其卑鄙的诬陷，难道还不应该坚决予以彻底推倒吗？

I、关于“中间人物”论

荃麟同志是怎样“鼓吹”所谓“中间人物”论的呢？他针对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文艺创作要反映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揭露矛盾，目的是为了“克服矛盾，教育人民”。他认为，围绕这个中心，还有一个人物创造问题。他说：

^①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最近几年，创造的人物绝大部分是先进人物，倔强的老头，生龙活虎的妇女，生气勃勃的青年。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况人物的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亭面糊这个人物给我印象很深，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又有旧的东西。毛主席也说，要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这样就更丰富了，写得更丰富更深刻。只有把人物放在矛盾斗争中，不然性格不突出。……”

“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如果实事求是的话，从荃麟同志这些话中，可以归纳出来的结论，恰恰是和一九六四年《文艺报》编辑部的批判文章完全相反的。他的原意是：第一，强调描写英雄人物是应该的，但也还要重视对中间状态的人物的描写；根本没有主张“要大量描写中间人物”。“大量”两个字是强加的。第二，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因此，“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根本没有主张“要集中笔力写中间人物”。“集中笔力”四个字是强加的。第三，说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因此，“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根本没有主张只“应当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这里，批判者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删去了“写英雄是树立典范”的话而歪曲了荃麟同志的原意。第四，认为要表现“矛盾的复杂，归根在人物性格（描写）”，把典型说成是“萌芽的东西，这也对”，“但从大量现象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否则，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路子宽广起来，就要写‘中间人物’”。这些话与荃麟同志是完全不相干的。可见，当年《文艺报》编辑部的批判文章所认定的几个对方的基本观点是假想的，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后面的一系列批判也就无从谈起了。

然而，批判邵荃麟同志时，最主要的一条罪状就是认为他主张用写“中间人物”来“反对写英雄人物”，是要“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这完全是凭空虚构的。

事实是，荃麟同志在大连会议期间的多次发言中，不仅从理论上强调文艺创作描写英雄人物、先进人物是应该的、十分重要的，认为“英雄人物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写英雄是树立典范”，将对广大读者起着示范教育的作用；而且还热情地肯定了当时文学创作中描写英雄人物形象所获得的新成就。他认为，最近几年，人物描写还是比较多样的，面还是比较宽的，人物的“革命精神，新的道德观念（写得）很充分”。他曾列举到《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以及《李双双小传》、《耕云记》、《静静的产院》、《张满贞》中的一些先进的妇女形象，还有“写实事求是与浮夸对立的”《实干家潘永福》、《乡下奇人》等等。他热情赞扬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先进人物都是各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同时，他还提出要把人物放在矛盾斗争中，更深刻地描写人物的个性特点，更细致地写出人物的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更突出地揭示人物的典型意义，这也正是体现了荃麟同志重视、关心英雄人物创造的问题提出来的积极的要求。这是完全正当的。怎么可以无视这一系列意见，提出一条反对写英雄人物的罪名强加在荃麟同志身上，这样的冤屈难道还不应该澄清吗？

诚然，邵荃麟同志也提出了文艺创作要重视描写中间人物的问题。他只是在批评了“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这个错误观点的前提下谈到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文学作品要描写出一个典型环境中间，有各种各样性格的人物；描写出在一定环境下，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是典型人物，梁三老汉、郭振山也是典型人物。《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是典型人物，严志和也是成功的典型人物。但是，有些人往往只注意了梁生宝、朱老忠，而

不注意以至不承认梁三老汉、严志和的典型意义，“似乎不是先进人物就不是典型”；在描写英雄人物时硬要去拔高，而不是去努力揭示英雄人物怎样通过艰苦复杂的斗争过程成长发展起来。这都和“一个阶级只有一种典型”这种理论有关，而这种理论对于创作造成的压力往往是很大的。荃麟同志希望作家们要打破这种简单化、教条主义、机械论的束缚。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观点，他希望作家们在描写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要重视写好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认为写好这些人物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农村现实生活中这些人物往往占大多数，也就格外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鉴于前几年农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和农民中存在的复杂思想状况。邵荃麟同志说：“在方向上决不能动摇，人民公社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解决农业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关系，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任何事情都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没有人怀疑集体化的方向，但是必须看到这条道路是长的、复杂和曲折的。一九五八年有人说，两年零八十天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是可笑的”。针对这种情况，他认为文艺作品对农村复杂的斗争面貌反映的还不够，还有简单化的现象。这种简单化也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创造，人与人的关系，斗争的过程等等。他要求注意到“农民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更深地去认识、了解、概括生活中的复杂的斗争，更正确地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使作品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量。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无产阶级、农民等也都会保留有一些落后的思想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① 这两者的精神显然是一致的。而且直到今天，我们的农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村现实生活的复杂情况也都证明荃麟同志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总之，荃麟同志就生活、矛盾、人物创造等问题谈了许多意见，其中也有偏颇、不正确的地方，但是他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教育是我们文学的根本任务。”这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的。《文艺报》编辑部文章说荃麟同志“说来说去，无非是要把‘写中间人物’推到文艺创作的最主要最中心的地位”，来和“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相抗衡”，是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文艺创作中的人物创造问题是美学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探讨的课题。解放以后，围绕人物创造问题有过许多次反复的论争，也曾出现过许多概念，如英雄人物，先进人物，正面人物，成长中的人物，转变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落后人物……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讨论清楚的。这对促进文艺创作，正确解释某些文艺现象将是有益的。在对待“中间人物”这个概念的解释和理解方面至今也还有可以商榷研究之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因为邵荃麟同志说了一些要重视描写“中间人物”的话就乱加批判。特别是“四人帮”丧心病狂诬陷邵荃麟同志的政治观点和文学主张是汇集在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逆流中的“一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诬陷邵荃麟同志是“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学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等等这些诬蔑不实之词，难道还不应该予以彻底平反吗？

II、关于“现实主义深化”论

这个问题比“中间人物”论也许要简单些。因为邵荃麟同志并没有提出什么“异端邪说”，他只是根据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生活实际谈到这个问题。邵荃麟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第一，文艺创作要写真实，要写作家自己“所看见的，所感受到，所相信的”。

第二，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进行深刻的艺术概括。荃麟同志说：“光感受还不行，还应有理解力——理解是通过形象及逻辑思维进行的，最后是概括力。没有概括力写不出好作品，我们社会独立思考往往被忽略。作家当然应该了解政策，但是应该通过自己的思考去了解、认识”，从而使“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

第三，要求思想内容的革命性与生活的真实性相结合。缺乏真实性的革命性是不可靠的、浮泛的、甚至是虚伪的。当时创作中流行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浮夸的浪漫主义，无冲突论，不敢正视现实斗争的严重性，不敢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困难和挫折。所以荃麟说：“怎样更深刻地反映当前农村的复杂、尖锐的矛盾，革命性和现实性更好地结合是大家所追求的。”“前几年有种舆论，好象平平凡凡，劲就不够，这是一种偏见，首先要看艺术有没有感动人的东西。我看我们还是百花齐放，看扎根深不深，现实主义基础深不深”。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是真实地反映生活。

第四，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复杂与单纯的关系。这里主要是就短篇小说创作而言的。荃麟说：“在某种意义上说，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难写，将一个复杂的东西，通过艺术的概括，以小见大，象树干的横断面，可以看出年轮及树木的性格。复杂与单纯的关系，通过单纯看出复杂，一粒米看大千世界，这与单纯化不同。”

如果说，在建国后十七年中，文艺战线曾经不断发生过“左”的干扰和破坏，那么表现在创作理论上，对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不正确的、错误的解释也是一个方面。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期，象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过份强调了人的主观因素、冲天的干劲而忽视了客观规律、现实的可能性一样，在文艺创作中曾经过份强调了革命浪漫主义（实质上，后来成了浮夸的浪漫主义）的作用，而不愿意承认革命现实主义的重要性，甚至往往把强调现实主义的作用的同志

说成是坚持“资产阶级的老一套的创作方法”，与胡风的主张联系起来，迫使人们抛弃现实主义，屈从于浮夸虚伪的所谓“浪漫主义”。这种错误理论在创作上带来的危害是很多的，教训是深刻的。荃麟同志在大连会议上关于现实主义所说的一些意见，不过是维护了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而已。

然而，对于这样一些意见，竟然横加挞伐，诬为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逆流、黑论长达十余年，岂非咄咄怪事。

邵荃麟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作家，也是长期从事党的文艺领导工作的老同志。许多年来，他带着病弱的身体坚持战斗在文艺工作岗位上，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大连会议的召开和他在会上的这些发言，也都足以说明他是忠于党，忠于革命文艺事业，具有理论上的创见和勇气的好同志。然而，这样的好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却锒铛入狱，惨遭迫害致死。今天，我们应当为荃麟同志平反。我们深深怀念这位文艺战线的老同志，我们也深切感到应该学习他这种可贵的求实精神和理论勇气。

这里还需要指出，因大连会议、“中间人物”论问题而遭受残酷迫害的远非荃麟同志一个人，而是株连甚广的。不单是参加大连会议的作家评论家们无一幸免，而且“中间人物”论的帽子满天飞，一部分省市也跟着批判了一批所谓写农村阴暗面、写“中间人物”的作家作品，许多电影、戏剧、小说被诬为写“中间人物”而被打成毒草。言者有罪，积极工作有罪，关心政治有罪，反映人民思想感情有罪。党的双百方针，文艺领域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一次粗暴的践踏。这些残痛的经验教训，人们记忆犹新，是值得我们深切记取的。

其次，在创作中带来的危害更是难以估计的。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纪要》中就攻击说：“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